

潘超 孙忠铨 朱锦翔 ◎ 主编

安徽古典风情竹枝词集



蕊榜金泥御押封，

当头黄盖簇芙蓉。

天恩许步中门出，

更比蓬山上几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古典风情
竹枝词集

潘超 孙忠铨 朱锦翔 ◎ 主编

ANHUI GUDIAN FENGQING ZHUZHICI JI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古典风情竹枝词集/潘超,孙忠铨,朱锦翔主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396-4760-9

I. ①安… II. ①潘… ②孙… ③朱… III. ①竹枝词-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①I222.82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沈喜阳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5152158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 字数:160千字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欢迎本书的出版

张脉贤

情动于衷，歌之咏之。以诗言志，以诗抒情，以诗绘景。诗人，就是诗的主人公。各种体裁的诗歌，如无疆瀚海，且与日俱增。其中，触景生情随口唱出或随即欣然命笔记下的“竹枝词”，有更多的即兴吟出的抒写自由，有更多的乡土芳香，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因而更受群众喜爱。我在讲黄山立体气候时，也经常引用：“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刘禹锡的功劳，在于挖掘与整理、珍惜与弘扬原生态文化，把巴蜀民间唱词化成了千古绝唱的“竹枝词”。潘超等先生的贡献，在于能茹苦含辛地把跨越千年、珍藏分散的“竹枝词”汇成《全编》之巨册，在文化史上作出了难得的历史贡献。据我所知，我们经常读到的唐诗、宋词多为三百首的版本；《敦煌曲子集》虽收集多年，才一百五六十首；《古诗源》十四卷，总共不过八百篇；最突出的《诗经》原本，收集了从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共有六百多篇，加上十五个诸侯国的“国风”，达到了三千首；但《诗经》的原本早已失传，传至今日被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的《诗经》，也只有三百零五首和三百一十首两种版本。《中华竹枝词全编》，包括在其中占有重要



组成部分的安徽卷，浩浩乎始于唐、止于民国的 4500 位作者的 69000 多首作品，是千余年来历代诗人们的思想荟萃和艺术结晶。它不仅留给后人一部基本上能展示竹枝词全貌的巨制，也留给后人一幅了解不同历史阶段各地风土人情、人文习俗的多彩画卷。无愧为一部人文历史的百科全书，是一件珍品，一部宝书。

如今，把安徽卷单独结集，这对让世人更好地了解安徽的古典风情，让世人更好地欣赏历史悠久、绚丽多彩的徽文化，将是大有裨益的。我热烈欢迎《安徽古典风情竹枝词集》的出版！



（张脉贤，曾任安徽省旅游局局长、中共黄山市市委副书记。徽学专家。）

序二

“竹枝老人”和他的《竹枝词》

武旭峰

用“老人”这个称呼来代指我的师友潘超先生，实在有点不太习惯。因为在我的心底，他一点都没老，还是 25 年前我在贵阳初次见面时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但是由于他在进入老年阶段后醉心于收集、整理和研究“竹枝词”领域的不懈努力和卓越成就，圈子里的朋友都已敬称他为“竹枝老人”了，于是我也从众，改称“老潘”为“竹枝老人”。

我对“竹枝词”完全是门外汉，与“竹枝老人”相识、相知也只为旅游，所以当老友要我为《安徽古典风情竹枝词集》写几句话时，套用小品演员宋丹丹的话说，“那家伙”我是“相当的”为难。考虑到我是安徽人，书中又尽是安徽事，无法推诿，只好硬着头皮来写几句题外话。

从有关潘超先生的资料中得知，从 1992 年以来，他就把宝贵的人生献给了《竹枝词》。先后出版了《中华竹枝词》、《中华竹枝词全编》、《广东竹枝词》等典籍，总字数超过 1200 万字，厚达万页、高可没膝，特别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竹枝词全编》，竟收集到 4500 多位作者的 69000 多首作品，比《全唐诗》还多 40%，堪称奇迹，这不能不让我对这位“竹枝老人”刮目相看。



纵观中国历史，编纂《全唐诗》这类鸿编巨著，大都由朝廷和官府组织完成。《诗经》是天子下令民间采集、总纂而成；《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本来就是朝廷的“公务员”；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是由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全唐诗》是富可流油的清代江宁织造曹寅等人奉敕编纂；眼下正热的巨著《群书治要》，更是由唐太宗亲自下令命重臣魏征、褚遂良等人整理史料、编纂完成的。所以，能像潘超这样仅凭一介书生之力，编纂这样一部鸿编巨制，其气魄之大首先就让我叹为观止。

依我浅见：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当下，一个能在京华之地、红尘之中，二十多年如一日，静下心来编纂这样一部巨著的学人，至少要有三个条件：这就是大德、大才、大隐。

编书为什么要有“大德”呢？这是因为编纂《安徽古典风情竹枝词集》这一类的著作，和曹雪芹写“看来字字都是血”的《红楼梦》不同；与李太白“五岳寻仙不嫌远”写《行路难》不同；也与“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汤显祖写《牡丹亭》不同。他们或抒发个人心境、或撰写传世作品，说到底还是在为自己创作。而收集、编纂《竹枝词》实在是一件“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情，仅仅靠文人意气不行。没有官方背景的潘超先生肯花费巨大的力量去做这件无名、无利的事情，借用一句很不合时尚的老话就叫“发扬舍己为人的雷锋精神”。没有很高的道德情操，是不会担此重任的。

关于潘超先生的德行我感受很深。记得1989年9月全国旅游期刊总编辑聚会贵州，我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了这位谦和的老大哥。印象中潘超非常随和、低调、亲切，主持会议的他对我这位来自偏僻黄山的年轻总编辑也格外注意关照和提携；出席会议的全国各家旅游期刊总编辑也都觉得老潘是我们的当然领头人。没想到在离开贵阳前的一个晚上，一向随和的潘超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突然翻了个“个”。原因是为了表达盛情，贵州省某部门给与会代表每人送了两瓶货真价实

的茅台酒，作为礼品大家都已笑纳并装进行囊。谁知当晚9点多钟，潘超突然敲开代表房门，面孔严肃、不容分说地要我们把茅台酒全掏出来、退回去。这在当时鲜有先例，大家都很不满，但他非常固执，我们只好照办。次年在黑龙江聚会时，我们气还没消，他却早忘记了。1990年去苏联采访时，我买了很多“垃圾”，进出海关，他帮我提行李、当翻译，关怀备至；当年全国旅游期刊联合举办“神州旅游杯”征文活动，在由冯骥才先生牵头、从维熙等专家组成的评委会上，作为评委会秘书长的老潘力挺我采写的那篇报告文学《假如黄山失去国宝》，最终赢得共识，列为一等奖第一名，为我的创作历程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0多年前我去北京参加国际图书展，70岁的老大哥竟然在天寒地冻中冒着冰雪，赶到宾馆看我，还是那副随和、亲切的面孔。24年后回头想想，两种情景、“两幅面孔”折射出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什么叫“德”，这就是！

在我心中，潘超先生没有“大财”却堪称“大才”。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一代才女林昭、神童作家刘绍棠皆为同学，是国家体委主办的《体育报》资深记者。随着邓小平同志1978年提出发展旅游事业的宏观决策，老潘从挚爱的体育部门华丽转身，调入国家旅游局。1985年初，时任《中国旅游报》社务委员（第二把手）的老潘，以爱国思想孕育出的智慧，策划并组织了引发国人热情、媒体关注的评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活动。这种在今天早已被炒作烂了的“评选活动”，在28年前却无异于一阵飓风吹过旅游界。因为是全国、全民投票，一个新鲜概念——“中国旅游”让国人眼前一亮，过去名不见经传的旅游业神威大震，活动得到了国家领导人、海内外媒体和广大游客的广泛好评。全国人大常委会彭真委员长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之题了词；国务院分管旅游工作的陈慕华国务委员在出席评选结果公布大会上高兴地宣称：“评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是一项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它不仅可以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而且能



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锦绣河山和古老的历史文明。”无数群众认为：“这是件让大家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符合人心、顺乎民意的好事！”潘超在抒发爱国情怀的同时，也显示了他的“不唯上、不唯书”的科学美学史观。中国“十大风景名胜”评选的结果，古人早有定评的“五岳”中诸多名山“名落孙山”，而安徽黄山意外当选，许多人大跌眼镜，当时名气很小的黄山喜不自禁，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那时我正在担任《黄山》旅游杂志社的副总编辑，接到消息狂喜不已，连夜写下长篇评论《当代徐霞客们的权威评判》。从此，黄山旅游名声远扬，才有了“世界遗产”的后话！

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在浮躁繁华、功利心切的都市里，编纂《中华竹枝词全编》、《安徽古典风情竹枝词集》这样的典籍，不是一位真正的“大隐”，不可能完成。出版部门有一句行话：编辑是“好孩子不肯做、癫孩子做不了的事情”。眼下人心浮躁，能干的人都在赚钱、数钱、攒钱、捞钱，谁还有心思给文稿校对标点符号？谁还甘于淡泊帮别人做注释、校勘？编《安徽古典风情竹枝词集》这份工作，村学究不行、洋学究也不行，追名逐利者不行，心如枯井、情若死灰者更不行。它需要才智、也需要激情，正所谓“书稿成时人亦老”、“蜡炬成灰泪始干”。担此重任者，没有学者的精神不可，没有“大隐”的境界不行！

偏偏京城出了潘超，一个“在没有活动经费和办公地点的情况下”，躲在皇城门下，邀集三五好友，花费20多年人生来完成这一伟业的“真隐者”。我过去对潘超先生的家事不太了解，直到2009年我去北京开会，老潘邀请我到潘家园他的家中作客，这才知道他的夫人是一位著名的彩塑艺术家，是“泥人张”的第四代外姓传人，所捏泥人个个鲜活灵动，中国泥人博物馆里收藏有她的作品。退休后两位老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各自沉浸在隐逸、潇洒的世界中。潘超的子女都已事业有成，有的还在国家机关工作。假如老潘是个俗者，

凭借他的资历、人脉、关系、能力，当个京城倒爷、旅游掮客、文化商人、规划“大师”，当绰绰有余。但隐者就是隐者，他能在红尘喧嚣之中把“情”寄放下来，他能在金钱诱惑之下把“心”安定下来，20多年只为编纂《竹枝词》，“为能规范苦追求，字字行行都勾留”，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绝非利禄熏心的俗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老潘知道我是安徽徽州人，也写过几本徽州旅游文化的图书，所以他给我寄来的文稿中，大多是前人所写的黄山、徽州《竹枝词》，这让我读后尤为亲切。比如民国《屯溪竹枝词》里“江西会馆下街头，一片牌声满画楼，叫句客人房里坐，居然红粉卖风流”，活灵活现地勾勒出这处卖春场所的旧时情景；清代《石墨岭竹枝词》中“侬家生长此山中，台峙浔阳一径通。欲往渔亭坐牌去，不须帆挂遇鸿风”，准确无误地描画了古黟渔亭的地理风貌，读来脍炙人口。

由此让我想到了《竹枝词》与旅游的关系。古人称竹枝词“志土风而详习尚”，指出它的特点就是以吟咏风土为主要特色。我几乎没有读到过任何一本文人著作能像上述《竹枝词》这样记录屯溪“下街头”风貌的，这种对民俗风情的生动写真，对名胜景观的准确描摹、对民间生活的忠实记录，于我们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地域旅游文化开发时不可不读的典籍。现在很多城市、很多景区都在感叹“无魂”，各路“招魂大师”都在忙着“找魂”，其实，“魂”也许就在《竹枝词》里，读《竹枝词》就是旅游景区“找魂”的最好路径。

近年来旅游界都在说“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不过在我看来，真正懂得文化、倚重文化、开发文化的旅游企业家并不太多，不少人是叶公好龙，口头上喊喊“文化”，或借文化装点面子，或拿文化贴贴标签，就像某位董事长的书架上摆满木制的图书模型一样。而安徽省旅游集团在许多出版社都变成“出版商”的情况下，愿意担当，愿意支持出版《安徽古典风情竹枝词集》，这让我很是感佩。也许有些人以为安徽省旅游集团作了一桩赔钱的买卖，但我要对安徽省旅游集团



说，你包揽了安徽的旅游文化，你大发了！

2013年8月19日下午

（武旭峰，旅游文学作家，民间文艺家，曾任《黄山》旅游杂志社总编辑、《旅游界》常务副总编、广东旅游出版社总监；广州大学客座教授，广东省内10个市县高级旅游顾问，《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旅游顾问。著有《中国之旅》、《中国精华游》、《发现婺源》、《找寻徽州》、《吞吐黄山》、《人文惠州》、《天医从化》等50多部旅游文学作品。）

008

前言

“竹枝”原本是巴渝一带广泛流传的民歌，唐代诗豪刘禹锡出任辖有巫山、奉节等地的夔州（今重庆市东北部）刺史时，经常接触，不仅喜爱，而且学唱，直到“故余亦作《竹枝》……俾善歌者扬之”。他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等两组十一首竹枝词读来清新明朗、含思婉转、情韵悠长，既有文人诗的长处，又有浓郁的民歌韵味，质朴而生动地展现出巴渝乡土风情，从而开创出了我国文学史上这种民歌体文人诗的体裁——竹枝词。

刘禹锡的《竹枝词》一面世，立即得到同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推崇，李涉等也起而仿效。随着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竹枝词的题材也从最初状写男女倾慕的爱情之作，逐渐扩展为诗人们抒发对江山的豪情，褒贬社会的时政，记录世事的兴衰，评论时代的人物，叙谈民间的百业和记叙包括劳动生产、婚丧嫁娶、喜庆节日以及人际交往等等多彩的民俗风情，竹枝词成了一种以泛咏各地风土民情为主要内容的诗歌体裁。流传的地域，也从巴渝逐渐传及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甚至海外邻国。唐以后的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历代大诗人，诸如苏东坡、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袁桷、虞集、杨维桢、徐渭、袁宏道、王士禛、查慎行、郑板桥、袁枚、黄遵宪、苏曼殊等等都有竹枝词佳作传世。当代“竹枝”在报刊上也时有所见。安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仅众多安徽籍的人士用竹枝体状写了各自深有体味的故乡风土，许多外地来皖的人士也被安徽风土激起创作的激情，从而留下难忘的诗篇。无怪乎现代著名学者任半塘在他的名著《唐声诗》上叹服道：“自来民间俚艺，受文人重视如此者，史无二例。”

历代文人所创作的竹枝词，主体句式是以刘禹锡的作品为榜样的——七言四句。但也有极少数七言二句、七言八句、六言四句的，北



宋贺铸的《变竹枝九首》甚至“变”成五言四句体。这表明竹枝词的句体形式，不像近体诗那么严格。

随着竹枝词流传地域的扩展，地方特色的日趋显现，题目也不再像刘禹锡只标“竹枝词”那样单纯了，正像清代乾隆时诗人卢文弨所说的：“竹枝起于巴渝，因其流传渐广，遂有‘江南竹枝’、‘渔歌竹枝’之殊称。”（见《蠡塘渔乃·序》）。最常见的就是在“竹枝词”前冠上地域之名。例如《西湖竹枝词》、《扬州竹枝词》、《羊城竹枝词》、《燕京竹枝词》等等。在“竹枝词”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有些诗人把“竹枝词”做了向本土化演变的推进。明末广东著名诗人“岭南三子”之一的屈大均以当地特产荔枝为题材写出了《荔枝词》。清代乾隆年间的诗人顾光写他杭州家乡盛产桃子的特色，推出了《桃枝词》，他在序言中说：

“竹枝词于乐府杂曲外别具音调，后人继作有柳枝、橘枝诸词，可谓极妍其妙矣。余乃作桃枝词，欲以嗣响前哲。”基于相同的思维，于是广西出现了《榕枝词》，台湾出了《蔗枝词》，浙江还有《桂枝词》，陕西、河北推出了《枣枝词》，盛产柑橘的浙、苏、赣、皖、两湖等地都推出了《橘枝词》等等。同时，有些诗人或出于创新，或为了突出个人风格，使竹枝词的别名异称现象更趋于明显的多样化了。最突出的，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圩丁词》，他在《序》中说：“余因作词，以拟刘梦得竹枝之声。”可见这组词是仿效竹枝词而作出的。清代得硕亭写京都（今北京）风情的组诗，是大家认同的优秀竹枝词，题目却是《草珠一串》。晚清时黄遵宪所写的那组长达200首的《日本杂事诗》，又是公认的写日本历史风情的优秀竹枝词。本书中李文安的组诗《村居》，题目并没标出“竹枝词”字样，在自序中说明的也是：由于村居“得五十题，各缀以七绝一首”，待到全诗结尾的第50首，他却总结为“杂景闲编五十诗，……鼓吹升平唱竹枝”了。可见他的50首“七绝”就是50首“竹枝”。本集选录作品的原则，不采纳只有题目标有“竹枝词”者才算“竹枝词”的另种主张，而是认同竹枝词同体异称的演变史实及其名称的多样化，关键是要保有七言四句体的外在句型和泛咏风土的内容。

上个世纪，我和几位学者编辑了一部收集有千余名作者、两万余首作品、255 万字、内容涵盖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风土的《中华竹枝词》，荣幸地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于 1997 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得到社会上的注意和好评。我国古典诗词权威杂志《中华诗词》作了较长篇幅的新书介绍，一些地方报刊刊登了出版消息；甚至被学者赞为“前无古人”的“竹枝词林巨制”，是“历史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界一个新出现的宝库。”（见 1998 年 6 月 17 日《中华读书报》和 1998 年第 2 期中华书局《书品》杂志）。在这种社会背景鼓舞下，我们决心继续深化，汇编一部竹枝词的全集——《中华竹枝词全编》（以下简称《全编》）。

1998 年夏，我们着手辑录《全编》的工作，在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多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从国家图书馆、多个省市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以及多个高校图书馆，我们翻阅了所能搜集到的此前已经公开出版的前贤学者们汇编的竹枝词集和一些专著，同时从这些图书馆和一些朋友处借阅到他们所收藏的历代文人写有竹枝词的专集、方志、报刊等等诸多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善本、孤本，甚至是抄本、稿本以及正待修缮的残本。阅读这些载体时，我们也研读了作者的自序、自注和自跋，同时参阅了能够看到的相关论述，从而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既明辨了一些问题，也吸纳了一些卓见。整个编辑过程，可说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所以我认为：这些文献书刊的著者、编者、学者对本书的编选辑成起了指导作用（见《全编·前言》）。其中，《全编·安徽卷》可足道者，在 1997 年出版的我们那部《中华竹枝词》中，安徽部分只辑有 241 首作品，待到编辑《全编》时，我们《安徽卷》的主编才发现早在 1993 年安徽黄山书社就出版了欧阳发和洪钢两位先生编的《安徽竹枝词》，其中状写安徽风土的作品，多达 543 首，这自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和参考。（另篇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我们的编者采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历代竹枝词》，其中多处缺字，《全编》时别无参照，只好照录。直到这次出版本书时，



才由出版社的责编沈喜阳先生根据胡益民教授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使之完璧；此外，沈编辑还帮我们增补了江耀华的《茶庄竹枝词》36首。）经过八年的发掘、整理、校勘，终于编辑出了始于唐代、止于民国、跨度长逾千年、辑有约4500位作者、69000余首、800万字作品、基本上能概括竹枝词全貌的《中华竹枝词全编》。

正是出于我们对古今人士对繁荣和传承竹枝词创作和发展贡献的感念，所以，在《全编》的《前言》中，就曾郑重地声称，“这部书的出版，是所有有关的中华儿女集体劳动的成果，是所有有关人员智慧的结晶，是所有有关人员献给世人的礼物！”本书原是《全编》的组成部分，自应如是。

把我国古代诗坛上数量浩繁、超过《全唐诗》总量40%还多的竹枝词总汇成如此巨册，自有其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和传承的文化价值。正是基于这种意义，引起了多方面人士的关怀和厚爱。出版前，我请有关同志题词作序时，都热情地给予了回应。其中，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的孙家正同志以总领全国文化事业的宏观高度题赠了“发掘民族文化宝藏，丰富祖国锦绣艺苑”；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会长邢贲思教授以哲学家的眼光题写了“传承优秀文化底蕴，开拓广阔风物视野”；国家旅游局副局长、诗人孙钢同志则从鉴于反映了各地历史风土民情，丰富了旅游文化内涵着眼，作《竹枝词三首》为贺。

安徽省旅游集团从弘扬祖国诗歌瑰宝以丰富安徽旅游文化着想，意欲把《全编》中的“安徽卷”单独成册出版。此前，已有广东教育出版社邀请《全编》“广东卷”的主编钟山教授把“广东卷”斟酌增补后出版了《广东竹枝词》。效法这一做法，我对“安徽卷”也做了一次全面审查，参阅了不少文献资料，对“安徽卷”中的缺漏做了些补正，同时把新发现的作品补充进来。但愿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徽文化”中这簇“竹枝”花束在伟大的复兴时代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潘超于2013年元月 8月18日改定

凡 例

1. 本书共收录有 230 位作者的 249 篇 2090 首状写安徽风土民情的竹枝体的诗词。

2. 全书各篇排序，以题目笔画的多少安排，少者在先。笔画相同者，则依据起笔笔形（横、竖、撇、点、捺）的先后为序。同位字相同时，按下一字排，顺延类推。题目完全相同者，则按作者诞生之年先后为序。

3. 在每篇作者姓名前，都冠有作者所处的朝代，一般是以其生卒年代而定。对适逢改朝换代之际的作者，如果尚未成年（未满 18 岁），就列为鼎革后朝代的人；如已成年，则依据其对前后政权的态度而定，对两者都采取支持或顺从者，注以两朝，例如“明—清”等；对鼎革后的新政权持反对态度者，为尊重其气节，仍列为前朝之士，例如，鉴于清军入关后实施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灭绝人性的野蛮屠杀举措，从而举旗反清、或遁入空门、或隐居山野的明末遗民，仍署以“明”人；对那些在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反对民国、或携带巨金跑到海外当寓公的“前清遗老”，无论死于何时，都列为“清”人。对生卒年代不详的作者，则依据其主要活动时代或写作诗篇的大致年代，冠以朝代。

4. 全书所录诗篇，均源自文献资料，每篇均注明有原载体，并保留原有的序、跋、注文，以便读者核查、研究。

5. 为了方便读者，编者对原作中的一些词意、生僻字词和涉及的地域、年代等，作了注释，都注有“编者注”。

6. 篇末的“作者简介”，为编者所撰。对凡收录有两篇以上作品的作者，只在第一篇处予以介绍。有些作者生平资料始终没能查到，难以作出介绍的，只好阙如，为免版面繁琐，也不逐一另作说明了。

7. 本书前有《目录》，后有《作者索引》，以供检索。



主编简介

潘超，河北沧州市人，高级编辑，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系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体育报》社时，以开拓创新精神报道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大成就，国家体委授予“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在《中国旅游报》社时，策划并组织了全民评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的创举，得到《人民日报》等众多媒体的报道和国务院分管旅游工作的领导同志的赞赏。主持《旅游》杂志社时，把双月刊的《旅游》改为全国旅游类期刊中唯一的月刊。担任《中国旅游饭店》杂志总编时，又鼓动、引导上百家旅游饭店办起了报刊并成为展示各自饭店文化底蕴的平台。他还担任过《神州旅讯报》社长，中国国内旅游协会代秘书长，以及《中国航空旅游指南》、《大酒店》杂志、香港文汇出版社旅游编辑部顾问，中国旅游文化学会常务理事等。主编（含合作）或撰写了《中国旅游指南》、《现代旅游业实务全书》、《中华竹枝词全编》等十五部共 1800 余万字的图书。

孙忠铨，辽宁沈阳市人，大学文化程度。曾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长期从事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曾参与编辑了《北京市新华书店店刊》、《北京地区出版印刷发行业名录》等刊物，多次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北京日报》、《集邮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离休后又先后担任《北京·新闻出版电视广播卷》第一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志·出版志》、《北京志·报业、通讯社志》、《北京志·期刊志》编撰委员会常务副主编；并亲自动笔参与了《北京志·出版志》、《北京志·期刊志》中发行篇章的撰写。还参与主编了《中华竹枝词全编》。

